

鉴往知来

刘皓宇 著

湘人书坊

昨天

我在日记的首页上写下

向党交心

立功赎罪

又红又专

永不后退

今天

我把这份日记发表出来

但愿后世的青年

再不要有我这样的经历

以我为戒吧

鉴往知来·一个右派分子在乡下的忏悔日记

2008年6月 湘人书坊

刘皓宇 著

鉴往知来

——一个右派分子在乡下的忏悔日记

2008年6月 湘人书坊



被划右派下乡前与母亲的合影

前 言

这是我被划为右派以后在乡下写的一段忏悔日记，也是我精神奴役创伤的一段记录。

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是新湖南报。在1957年，这个报社的编辑部共147人，其中打了54个右派，其打击面超过三分之一。共打了一个党内右派集团和一个党外同人报右派集团，还有一些零散的右派。我就是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的一份子（当时称我为邓苏集团一小丑）。这个右派集团被划的起因，是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这个所谓右派集团所坚持的办报方针是正确的。当时我只二十五岁，正年轻，在打右派的过程中，打手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小喽罗，无关大局，本已经放我过关，于1957年10月调我到株州创办株州日报。在那里工作了两个月，没有出一点问题。忽然，新湖南报社的反右办公室为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写一封信给中共株洲市委宣传部，要调我回去。我于1957年的最后一天，回到了火药味正浓的新湖南报社，在这里仅开了一次斗争会，一顶右派帽子便给我戴上了。从此，厄运加身二十一年，我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被视为异类的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于1958年4月下放到湖南南县农村劳动改造。当时我真以为自己犯了弥天大罪，我总以为党和毛主席是没有错的，错误的只能是自己，因而我痛定思痛地忏悔自己，下决心要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于是从受到处分的那天起，我决心记日记，用写日记的方法每天检查自己、省察自己。我在日记的首页上写着：“向党交心，立功赎罪，又红又专，永不后退。”我没有顾准、林昭、李慎之那样先知先觉，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够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我则是不停地骂自己，每天向人造的神祷告忏悔。这正如“星星画展”中一幅画所表现的：一个人的头脑已被人打得粉碎，但他仍跪在神坛前虔诚地悔过，求得神灵的饶恕。这是多么的愚蠢可悲啊！统治者最残酷的统治，就是从思想上进行统治，不断地改造你的思想，让你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只能以统治者的思想来思想。想想看，当年希特勒所提倡的不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吗？假如人们都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有另外的主义，另外的党，另外的领袖的话，那这个国家岂不是不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成为万马齐喑、死水一潭么？这样的国家还能够进步，能够实现人的现代化吗？

回想自从解放以来，国内不断地搞政治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接着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拔白旗，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革，有哪一个运动不是在批判思想，也就是洗脑筋呢？由于这样，人们搞得只能跟领导保持一致，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如果自己的思想、言论有一点越过了领导人的雷池一步，那便将万劫不复，成为人类不齿的异类。如果人们都是这样对待事物，那么这个世界还能够前进吗？还能够有创造性的思维吗？假如人们思考问题，首先要想到是不是合乎某一个领袖的意图，那还能出现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如马克思、爱因斯坦、爱迪生这样伟大的人物吗？《国际歌》上说“让思想冲破牢笼”，这正是我们说的解放思想，即从陈旧的思想桎梏中冲出来，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进步。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善于从总结、反思中求得前进的方向。

我的这段时期的忏悔日记，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和反面来看出精神奴役所带来的毒害和伤害，有何等的惨痛！反右派运动把人们一点点说真话的权利、一点点独立思考的权利都毁灭了，结果是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见风使舵、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之风盛行，正直的、讲真话人被打下去，而靠吃运动饭、打小报告、充当打手的人应运而生，因而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得不到任何抵制地在全国掀起高潮。人们热衷于“放卫星”、说大话，实事求是的作风完全没有了。违反自然规律的结果，带来了三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千万计，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后果啊！从我个人的思想来看，岂不有以小见大的作用么？古语说：“鉴往知来”。这也就是我要把自己这份日记发表出来的用意，但愿后世的青年，再不要有我这样的经历，也当以我为戒吧！

当然我的日记里，也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村大跃进中的种种苦难，那时搞的瞎指挥、黑白战、人海战术，不讲求科学，搞得种田的人没有饭吃，“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等等。记得当年我参加修堤，人挑土像蚂蚁一样，不分日夜，可现在有挖掘机、起重机、汽车，比起人力挑扛不知要强好多倍，这不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讲求科学、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么！我希望再不要出现当年我参与修堤、开渠，像秦始皇修长城那样的局面了。

鄧、苏右派集团的一小丑 刘皓宇的反党罪行暴露無遺

在右派分子刘皓宇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工商部的小組会上作了交代以后，在会上，同志们憤怒的質問右派分子刘皓宇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恶劣，托词搞繁多，对反右派斗争那么冷酷无情，在斗争会上老是打瞌睡，别人喊你，还说是“养神”。你自認沒有参加了家会議，这是避重就輕的謊話。你真实的执行苏克誠在丁家會議上布置的一套“安定老官、排斥老孟、包圍省委”的反党策略，他們講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也是鄧、苏集团的一名小小的但是十分忠实的爪牙，这还賴得掉！你在底下搞些村报道，什么时候插秧都不知道，三包定額一查不通，你从哪里得來的結論：我們報上我的經驗技術是外行看不懂，內行看了不解決問題呢？……你答覆。这样像連珠炮彈一樣的質問把他詰問得瞠目結舌，呆若木雞，好久还答不上話來，只得承認，“我是資產階級立場頑固、卑鄙、恶劣。”

右派分子刘皓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貨色呢？汪时亮、陈时君、李曉超、吳辛、任振華等同志在会上揭發的材料作了很好的回答。

存在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新聞观点

刘皓宇反对党对报纸的領導、監督，提倡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他反对刊登党委的指示、文告、會議消息，認為登多了这些东西，报纸就会成“傳声筒”、“布告牌”。他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在鳴放期間，否定党报的成就，提出要办“同人报”，和新湖南报唱对台戲，他強調报纸的权力，反对党的審稿制度。他在整風小組会上發言說：“審稿，还是層層卡住，怕犯錯誤，專門怕犯錯誤，倒會犯大錯誤。省委为什么不看上海的报纸。”周惠同志來報社時，他公开提出稿子審多了，要求縮小審稿範圍，他質問領導，为什么新聞界座談會的消息要送審？

刘皓宇強調“報紙特点”、“讀者兴趣”，反对报纸对实际工作的指導性。他对中心工作报道感到厭惡，認為这是压中心，赶浪头。他說“農業的宣傳一年四季都是一樣，到了插秧時滿版插秧，到了捉虫時滿版捉虫，这只要一本皇曆就够了；根本用不着报道”。他說“过去農民几千年来沒有報紙，谷子不还是种出了么？現在天天登，農民也不一定看了”。主張報紙除了党委的中心外，还可另搞一套中心，称之为“第二中心”。他在整風小組会上提出：“如今新聞报道範圍受了中心报道的限制，單調枯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多登社会新聞”。1956年他在安仁採訪向記者部寫信的信中，曾公开主張遠解份記者不必“赶中心”，要抓冷門。

他極其反对先進經驗技術的报道，提倡抽象地报道思想。去年三月份報上用比較多的篇幅宣傳了先進的經驗技術，他大喊不得了，說这样報紙會脫离群众，會變成內部刊物，他積極主張搞的却是“相思鳥”，“稻香鳥”等所謂有“思想性、鼓動性”的“群众所喜聞樂見”的东西，他很欣賞“梁山伯結婚了”這一類的新聞，很欣賞新晚報過去提出過的“歇些、再歇些”的口号。

刘皓宇主張揭露新社会的所謂“陰暗面”。他曾經寫過“奇怪的关心”、“郴縣專區工農矛盾緊張”、“解放軍隨便乱找女学生談恋爱”、“增產節約一陣風”、“領導上不关心勘探隊的生活”等一系列的稿件，把新社会描寫得“一团黑”。

他提出要向資產階級報紙學習，向旧記者學習，他对黨改进了方向的文匯報很感兴趣，認為它生动活潑，独具風格。对所謂“老報人”很欣賞，認為他們“有經驗有技術”。右派分子徐錦成提出要繼承旧報紙的傳統，他非常贊賞。去年五月，他去飛機場採訪，碰到香港來的記者，他一再誇耀他們“搶新聞”，“互相封鎖消息”、“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認為他們真有一手，缺不離，後來，他也學習着这种作風，对長沙日報、湖南工人報的記者封鎖消息。

惡毒攻击党的領導

刘皓宇反对省委：他認為省委不行，官僚主义，否定省委对报纸的領導，鳴放開始，他和陳雲岳等一道簽名寫信給省委，名义上說報社有許多問題牽涉到省委，要求省委來解決，实际上就是要省委向報社承認錯誤。省委來報社和群众見面以后，他在小組会上公开表示不滿，說“省委這次來，沒有把大家積極性鼓起來，使人听了泄气……”，老是說顧慮，顧慮，其实我們意見已提出來了，只是尊重不够、听取不够”。他責備周小舟同志对報紙成績的估計是过高，对我们改進報紙沒有好处。唐麟部長的發言，他極力反對，在小組会上攻击說：唐部長感到報社內部“鬧哄哄”，也与事实不符。報社內部还是在有領導有秩序地搞“小民主”，並沒有搞大民主。省委的講話，並沒有加強我的信心，反而挫折我的信心，使我迷失了方向。他極其惡毒狂妄的指責省委也不对，那也不对，說着竟犯了官僚主义。周惠同志不同意發“株洲工人關事”的稿件，他攻击周惠同志說“这是官僚主义”，是看到“翠工”兩字就怕了，這說明他（指周惠同志）对中央方針認識上有問題。有一次，他听到周惠同志說“最近小資階級心火”，這一次話以後，他就認為周惠同志在發脾氣，很不服氣。他說：“不得了。周惠同志發我們的脾氣，問題嚴重了”。省委以前不久在報社調走了一些不滿意，他表示很不滿，說

“报社的头头调走了十多个了，派来的都是不熟不懂的，这叫报纸怎么办好呢？”

刘略字攻击报社领导：他说官健平同志报告空洞，不熟不懂不懂，是原则错误。指责官健平同志身为全国新闻协会会员，既没有开展新闻协会的活动，更没有维护“报人”的利益。他恶毒的建議官健平同志看徐露成的文章，要官健平同志下台。他对孟樹德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罵孟樹德同志象个鼯鼠一样。软弱無力，沒有热情。

他是苏辛潮反党小集团的应声虫，苏辛潮、葛克誠講什么，他就听信什么。蘇克誠在丁家秘密會議上布置的一套“安定老官、排斥老孟、包围省委”的反党策略，通过李均傳授給他，他表示完全同意。他上述的反党行为就是按丁家會議精神及在苏辛潮——葛克誠——李均——嚴伯嘉这条黑綫貫穿之下進行的。

他还恶毒地攻击报社的人事部門，罵人事科象幽灵一样，說他感觉不到人事科的作用。

刘略字对其他各级党的負責同志，他也散布流言蜚語，进行人身攻击。他認为工農干部沒有文化，干不了什么事，是些老油条。他說省委員籍徐文同志“能力低，進步慢”；于明藩同志“雜亂無章”。至于下面厂礦的負責同志，他更瞧不起，說楊梅山煤礦党委書記趙美玉、水口山刘亞球等这些同志都是“老油条”；他把很多負責干部都說成是官僚主义，吃飯不做事的人。他說郴縣地委工農部 陈文理 副部长“肚子里沒有貨色，裝模作樣，儼然象一个大干部，动口則人，扣大帽子”，資兴煤礦党委書記宋英林是个“官僚主义的典型”，他还誹謗省委員楊第甫同志驕傲自滿，架子十足。

他对文匯報的“解冻”“乍暖还寒”“早春天气”这些文章非常感兴趣。对上海的某些报纸乱鳴乱放認为有气魄，要求省委向上海的鳴放看齐。文匯報借發表一封讀者來信攻击湖南省委不敢大鳴大放，他認为这是“批評”得很对。

当省委向报社提出的五项鳴放指示，他坚决反对。說鳴放还要个范围，这是“划地为牢”。右派骨干分子鍾叔河在評報欄質問周惠同志“如果对百家爭鳴規定了什么范围，也請一并公布出来”。他馬上寫了“同意鍾叔河的意見。請早些答复”。

他惟恐天下不乱，主張乱放乱鳴，坚决反对省委的五项鳴放指示。說鳴放还要个范围，这是“划地为牢”。在評報欄里，他和右派分子鍾叔河等一唱一和攻击省委。質問处理“陈局长寸步难行”这件稿子的立場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并限令公开答复，他說对陈局長的批評，表现得毫無党性，又無骨气，对这样的事，應該嚴厉攻击。而对攻击党領導的“这是鼓勵鳴鳴”的毒草，却認为是最精彩的，湖南医学院学生鬧事的“民主牆”，他也認为可以报道。更惡劣的是，当党外右派小集团正要为办“同人报”点火煽風，爭奪輿論，向省委和报社領導作激烈斗争爭取办“同人报”的消息見报的时候，他在小組会上支持他們，为他們助火升焰，擴大反党声势。

昨天

我在日记的首页上写下

向党交心

立功赎罪

又红又专

永不后退

背上右派的十字架

1958年4月26日 阴

今天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一天。我的政治生命——预备党员资格被开除了。我是人民的罪人、敌人——右派份子。我的一切虚假的进步外衣都被剥得干干净净，而丑恶的原形毕露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二生命，如今，我的第二生命完全丧失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啊！

的确，经过这一年来的斗争，我对自己是认识得比较清楚了。以前我口里喊拥护共产党，喊革命，甚至还对别人夸夸其谈地谈论革命，这一切都是虚伪的。我内心深处包藏着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脓疮。我不敢和它随时作斗争，不敢把这些丑恶的东西翻出来。一到了去年五月鸣放期间，有了这样的气候，这样的土壤，我就不顾一切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开始，我也存在着偶然论的思想，认为如果不是在邓、苏集团的影响下，不在新湖南报社，可能不会变成右派。这哪里可能呢？正如孟树德同志说的，我是这样一颗右派种子，不管播在什么地方，它都会发出芽来，开出有毒的花。我的这种右派思想是老早就形成了的，又怎么可能不是右派啊！

前段时候，我对错误不敢正视，我在亲友面前，不敢承认自己是右派份子，这实际上仍是用个人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从个人得失考虑。现在这种想法再不能让它存在了。我必须回去向母亲承认：自己是右派份子，不管这痛苦是多么大，也不管这会给母亲带来多大痛苦。

错误已经犯了，党籍没有了，马上就要受到行政处分。这一

切的确像针刺着我的心，但是我能够这样下去么？我还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给社会主义社会做一点事，我就能躺在错误之上悲观消极，悔恨疲沓下去么？不能，绝对不能。党早就说了，只要右派份子真心悔过，决心改造，人民是欢迎的，党内右派份子经过一个时期的（当然是相当长期）实践的考验，证明他已经改变了立场，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将来还是有机会回到党内来的。这不是清楚地给我指出了前途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乎自己，在乎自己愿不愿永远与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告别了。这当然不是口里说了就是，还要出自内心，有行动表现呀！是的，个人的历史是自己的言行写的，我既然写下了非常丑恶的黑色的篇章，我也就应该用自己的行动一笔一笔写出红色的篇章来。这得要我下多大的决心啦！

为了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向前看，我应该把错误当成沉痛的教训来汲取，让这件坏事逐渐转化为好事。右派份子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对我痛定思痛的改造是有莫大的好处的，我应该把什么个人得失都丢在脑后。

从今天起，算是旧我的结束吧！终点也就是一个起点的开始。今后，我为了监督自己，反省自己，决心每天记日记，也算是忏悔录和向党交心录。不管我有什么肮脏思想，都把它记下来，尽自己的认识批判，向党组织汇报，争取帮助。我再也不能跟党两条心了。

我还要考虑怎样订个人改造的规划，这得仔细思考才行。

上午 11 时报社开飞行集会，宣布对右派份子的行政处分，我被划为第四类；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职级降了 5 级，由行政 18 级降到 23 级，工资由 80.5 元降至 45 元。的确，对这个处分，我思想上是准备不足的，原先以为只降一至二级，没料想降了 5 级。当这一处分宣布时，我的心砰砰地跳，手也凉了。

这时，一股个人得失的情绪袭上心头。心想：党籍完了，再也不能在报社工作了（要知道就是这个新湖南报把我从18岁培养到如今的呀！）级别也连降五级。如今什么都完了。我的心像针扎。我有生以来也从没有经受过这么严重的处分啊！这时，我几乎没有“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勇气了。我又陷进了个人得失的泥坑。

但仔细一想，这仍然暴露了我的右派思想原封未动。为什么我听到宣布对我的处分时，不是首先考虑对人民的罪过呢？为什么不想到自己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了，而国家还给我工资，没有开除我，这已经是仁至义尽呢？为什么不想到自己的言行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呢？总之，听到处分，在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个人如何如何。这实际是个人主义者的规律：得志则飞扬跋扈，不得志则悲观消极。如何正确地接受组织的处分，对待自己的错误。这就是自己是否愿意改造的第一步，在这第一步上，我必须勇敢些。现在一切个人的得失都应该抛弃，全心全意痛改前非。我想，如果自己决心改造，这个处分只会起到促进作用的。我是会有光明前途的。

和其它右派份子闲谈，如何订改造规划。我初步地想，自己应该在一年半至两年内摘掉右派帽子，五年之内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来，这指标是否保守或冒进，我还得仔细地想。我应该拟出一系列保证实现这一指标的措施。

4月27日 晴

上午工作，中午吃过饭后，和段汝雯、何新明交谈了自己的思想情况。他们说：犯了错误，痛苦是免不了的，问题是再不要患得患失，爬不起来了。何新明说：“要对自己充满信心，无论党分配我做什么，在那里坚决干好，踏实干，用三倍努力来挽回自己的过失。”他说得对，我再不能有消极情绪了，挺起腰杆来吧！只要自己永远听党的话，我就不相信自己改造不好的。

下午回家去了，母亲正在街道上教居民的识字课。今年居民们选她当民校教研组长，她老更积极了。每星期日下午、晚上，都要去巡视老师们的教课情况，等她下课回来后，我把自己的全盘错误向她老交代了。以前，我一直不敢在她老面前说明自己是右派份子，我怕面子难为情，因为家里以前总认为我是进步的，我还怕讲了，她老对问题认识不清楚，会同情我的错误，引起她的痛苦。这次，我把错误的全部性质、经过以及处分都对她说讲了，并且要母亲痛恨儿子的错误，督促儿子改造。真没有料到，她老的觉悟比我高多了。她老鼓励我：错已经错定了，党处分你是按政策的，只怪你出身我们这样的资产阶级家庭（注：其实父亲是个职员、小土地出租者），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又没有彻底改造，到今天摔了跤子，但是你绝不要消极悲观，往前看，拼命干，来挽回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她还说：我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不堪改造的。我听了她老这番话，又想到她老年已六十，过去一直是家庭妇女，如今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三次获得优秀群师的奖励，还出席了长沙市优秀扫盲积极分子大会，我惭愧无地，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想到在新社会，到处在跃进，母亲也在跃进，我今天堕落成右派份子，怎么对得起母亲啊！

我谈到了家庭生活安排，说以后我只拿到40多元一月，自己尽量节省些，生活水平降低些。我虽有罪，家庭并没有罪，父母还是要供养的，我仍打算每月给母亲15至20元。如果我下农村，农村生活程度低，自己有20元也就够用了，能不用的就不用。今后衣服自己洗，破了就多补几次穿，伙食、菜金每月降到6元左右的水平，我的表也不戴了，存在母亲处，以备母亲万一有病痛时应急用。我想即使这样，仍要储蓄，养成俭朴的习惯。这一方面是从现状出发，另方面也把它看成改造自己的方式之一。她老同意我的打算，勉励我降低生活水平要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实行。她还

说：家中的生活不要成为我的后顾之忧。我们尽可能省吃俭用就行了，你一心去改造自己。傍晚接到父亲的来信，说他患高血压毛病，想住唐山气功疗养院。他以为我的工资没有降低，希望我寄些钱去。我看了信，心中真是莫衷一是。我想：这几年我铺张浪费，没有多少储蓄，真是自寻苦吃了。我没有敢对父亲的信作正面回答。

改造规划在脑子里已经想了个轮廓，还跟几个右派份子商量过，打算挤时间写出来，交给党组织。

4月28日 晴

今天下午，我和李均、陈望岳、鲁岫等交流了思想情况，并且交换看了改造规划，这给我的鼓舞很大，仿佛他们给了我一股力量，把我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李均说：他老婆要他每天记日记，每周要向组织汇报思想情况。他说：他现在很乐观，干劲也足。每有一点阴暗思想，就主动把它揭发出来。他还说：“右派这顶帽子的确臭，但有什么要紧呢？只要决心大，将来还可以更香，以前做了几年假共产党员，以后真正改造好了，做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岂不更好么？丁明凯还打算每天做一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如今他朝气蓬勃。这种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听了他们的这些话，想想自己患得患失，用个人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可耻。若我真能从党的利益考虑的话，真把共产党员看成是一块金字招牌的话，开除我这样一个冒充党员岂不是好事么？

李均又分析道：“现在的情况对自己的改造是极其有利的，因为经过深刻的批判、组织的处分，又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自己是痛得特别厉害的，因此决心也就比别人大。有些人有资产阶级思想，这次没有受到处分，他们是没有我们这么大的决心的，思想也没有我们这样勇于暴露，只要自己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在几年之内换个新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的确，这正如毛主席所说，

坏中有好的道理。我必须这样来考虑问题。做出十二分的规划，二十四分的干劲来。

回忆近来头脑里出现几种坏思想，必须暴露：一次，刘斌来查寝室，看我们在十点钟还没有睡觉。当时我把门扞上了，正脱袜子，他叩门了。我不是老实地起来开门，反而敷衍他，说都睡觉了。其实我还没有睡。这是我在犯罪期间接受管教很不心悦诚服。前段我在资料室填卡片，内心是轻视这种劳动，做起来不积极，慢吞吞地。有时率性看资料里的无关内容去了，这样工作效率也就不高。我想人民仍给我这么多钱，我却消极怠工，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呀！另外，虽然我改造的决心大，但其中有从个人出发的思想，我不是想到把自己改造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人，而是想经过一番改造，镀些金子，为将来仍能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以及升级打下基础。这多么可耻。

4月29日 晴阴

自从昨天跟李均、鲁岫等谈过思想情况后，我的思想开朗多了，消极的思想比以前减少了许多，这仿佛在我的身上增加了一股劲。干工作时自己一心一意地干，把多干点工作当成赎罪过程中的一种愉快。清早六点钟，我一起床，就动笔修改自己的改造规划，中午已交给整风反右办公室的湛长庚同志了。我非常希望他给我提些意见，他答应了。我想到党对每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只要他有一点进步的要求，是决不会拒绝的。这仿佛是一股暖流温暖着我的心。今后，我时刻要靠拢党组织啊！

我的规划中规定：每天要做一件对社会主义多少有利的事情，今天算是个开头吧！早晨xx来了，李冰封听说他不打算去劳动教养所，劝他再不要走绝路了。我把别人对他的最后忠告对他说了。我说：你过去走着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你年轻又有一定能

力,但太忽视自我改造,以致有了今天,现在如果又想做革命队伍中的逃兵,那就完全走向自取毁灭的道路了。我一看到他走的道路,又想到自己已堕入反党泥坑,就胆战心惊,害怕起来。我想:自己若不痛下决心,重新做人,他的今天离我并不是很远的啊!他听了我的话,也悻悻然说:我不去劳动教养所,又到哪里去啊!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去了。我给他的临别赠言是:希望重新改换过一个人,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但愿我这番话对他能起些作用。

今天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极坏的思想,我对党给我的处分,抱着跟人家比的态度。我认为严伯嘉的错误不比我轻,但处分比我轻,有些耿耿然。这真是岂有此理。我对党的处分竟抱怨起来。党处理一个人是根据事实,大公无私的,严伯嘉的错误虽不比我轻,但他觉悟得快,斗争积极,大胆检举揭发右派份子,而且对自己的过失认识得比较深刻,因此对他应该宽大一些。我呢?前段表现极不好,同情右派份子,没有义愤,而且在鸣放过程中嚣张得很,党给我这样的处分,已经够宽大了。我为什么不心悦诚服呢?自己不好好思过,还跟这个比、那个比,这样做,只会与党的距离越来越远。

真伤脑筋,有时恋爱问题又来缠我了。我想:我今年已27岁,犯了这么个大错误,几年内右派帽子摘不掉,谁还跟我这个右派份子谈恋爱呢?将来老了,更没有人跟我结婚了。想着想着,悲伤的情绪不能自抑。现在我必须把这个得失抛掉,我相信我是能够改造好的,能够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婚姻问题这几年根本不要考虑,因为老考虑也不现实。一心一意和工农结合,老实改造自己吧!

4月30日 阴雨

今天下午,我和资料室的同志愉快地劳动了一个下午,先是栽西红柿秧子,由我挑肥料、挑水,接着又锄草、打篱笆,这次劳动